

检察官举债14年资助贫困家庭

“是刘有仁哥哥救了我们一家人。”2007年12月24日，西北政法大学三年级学生韩鑫含着眼泪对记者说。

15年前，韩鑫正在读小学三年级，父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，家徒四壁的韩鑫三兄妹面临辍学，这时班主任薛润娥老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：有一个家庭条件“优越”的大学生同意资助他上学。直到2007年9月，韩鑫才得知，资助他们三姊妹的大哥哥当时也是贫困生。

贫困家庭命运的改变

1994年3月，刘有仁在西北政法学院(即现在的西北政法大学)读大一。当时学校号召大家为希望工程奉献爱心，刘有仁和同学们积极响应。刘有仁来自农村，他知道农村人的艰辛，也理解贫困家庭的孩子对学习的渴望。

刘有仁参加了“手拉手”的帮扶活动，他当时计划，在大学阶段，自己省吃俭用，勤工俭学，可以省出些钱来资助一个学生的学业；等到那孩子上初中之后，虽然资助费用会大幅增加，但那时自己已参加工作，应该也能负担得了。

在陕西省子长县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帮助下，单亲家庭、生活困难、品学兼优的韩鑫成了刘有仁的资助对象，韩鑫当时读小学三年级，是甲班班长。

据韩鑫介绍，他父亲韩文斌曾经是煤矿工人，母亲在家务农，他是家中长子。但1993年，父亲因患肝癌去世。

之后，韩鑫一家住在月租金仅几十元的旧窑洞里。母亲冯玲香无论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，都起早贪黑去卖煎饼。面对3个孩子昂贵的学费，冯玲香仍一筹莫展。韩鑫和他的妹妹随时面临辍学。

这时，刘有仁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，从此，爱心之桥

在一位贫困大学生与一个贫穷小学生之间悄悄地搭建起来，刘有仁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爱心之路。

从1994年至今，刘有仁按时将学杂费等寄给韩鑫，从未耽误。即使向同学借钱，他也会将韩鑫的学杂费凑齐。每年春节前，他都会汇钱给韩家过年。

据冯玲香说，14年中，刘有仁累计资助她们家3万余元，超过3个孩子所需的学费。1997年和2007年，刘有仁两次来到他们家看望。

现在，韩鑫与大妹已相继考上大学，二妹读高三。在韩鑫读大学的3年中，刘有仁每年都资助五六千元以上。“今后，我还将尽我所能，继续资助他们，直到他们全家走出困境。”刘有仁说。2007年12月25日，韩鑫告诉记者，2007年刘有仁又资助了他们家6600元。

举债资助的善举

孟子曰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资助韩鑫这样的贫困家庭，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并不困难。然而，对于当时的刘有仁来说，这必须付出十分艰辛的代价。

刘有仁家在湖南省新化县金凤乡，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省级贫困乡，全村480人，人均不到二分田，粮食不能自给，经济收入仅靠卖点树木、竹子换钱。当地村民的现状可概括为六难：吃饭难、行路难、喝水难、读书难、照明难、娶妻难。在这样的普通农民家庭，刘有仁上有姐姐，下有妹妹和弟弟。因家境艰难，姐姐在读小学时辍学。

从刘有仁记事起，借债就是他家的“主旋律”。十几年中，他家举债达7万多元，“债老板”有50多个。有一年，父亲刘仲文为了借一笔钱，往乡信用社跑了10趟，乡信用社的



刘有仁(中)和韩鑫一家人

人开始一直不同意借钱，直到看见刘仲文在一旁偷偷流泪，心才软下来。

据刘有仁的母亲回忆：在刘有仁考上大学的时候，为了筹措学费，她跑了几百公里的路，去安化、涟源等地亲友处借钱，最后还把自家盖房用的楼板和耕田的黄牛卖了2000多万元，才筹齐子女读书的学费。

但是，刘有仁却从没有间断过对韩鑫的资助，哪怕是自己向同学借钱也要及时筹齐韩鑫的学费寄过去。而且他从未向韩鑫透露过自己家的情况。

不久前，韩鑫在湖南省检察院网站上得知刘有仁哥哥家里当时的状况，他说：“我当时忍不住就哭起来了，哥哥他们家这么穷，还一直资助我和我的妹妹上学。”

刘仲文曾告诉记者，儿子上大学时，家里因为困难，有两个月没给他寄生活费。儿子却告诉家里，学校对贫困生有补贴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儿子为了不让家里担心，半个月里只吃馒头过日子。刘有仁资助韩鑫一家的事，不但外人不知晓，甚至连他的父母都不知。

刘有仁大学时的班长、现在厦门市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的张洪明谈起他时，

记忆尤为深刻：“读大学时，我就看出他家境困难，因为他是我们班上唯一不会骑自行车的同学。从大一到大四，他就是一件外衣穿到底。”

回想过去的苦难经历，刘有仁曾写道：“没钱买菜，从家中带一罐咸菜吃一个礼拜；没钱买书，向同学借阅聊以充饥；没有学费，暑假帮父亲进山伐木，带弟弟到矿山打石头……学习上不能放松，不然如何面对父母；生活上只能艰苦，否则无法继续学业。我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苦难，苦苦地支撑着求知的小船。”

在学校，刘有仁利用业余时间做家教，到街上发传单，一天下来腿都站酸了，能赚10多元钱。寒暑假一回到家，刘有仁又成了“农民”，除了帮助父母完成正常的农活，他还带弟弟妹妹修马路，到矿山打石头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记者在刘有仁的手掌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厚厚的老茧。

资助不停留在物质上

刘有仁对韩鑫的资助，不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14年来，刘有仁与韩鑫全家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和良好的互动。刘有仁经常去书市选购一些书籍和笔记本之类的

学习用品，寄给韩鑫及他的两个妹妹，常与他们通信、打电话，适时给他们的学习提供一些参考意见。韩鑫三兄妹也非常懂事，经常主动给刘有仁哥哥写信，告诉其学习、生活情况，与其进行真诚的交流。

“有仁哥，在你的帮助下，我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，我又上领奖台了，这一切都有你的一份。”“有仁哥，我很惭愧，这次中考没考好，没脸告诉你……”“哥，你在大学时课余都做些什么呢？……”他们之间更像是亲切的一家人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韩鑫一直立志要考刘有仁哥哥读的学校。2005年，韩鑫如愿以偿，也考取了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。“今年寒假期间，我回老家找了两份‘临工’，先是参加当地社区组织的‘秧歌队’，每天可赚30元；后来又帮人家卖鞭炮，又赚了200多元钱。”韩鑫兴奋地告诉记者。

韩鑫打算放弃考研，尽快找工作。“我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读书，我现在只想为母亲、有仁哥哥减轻点负担。”韩鑫告诉记者，他告诉两个妹妹，只要她们好好读书，他毕业后会负担她们读下去。

刘有仁无私的爱心支持和援助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韩家的三兄妹，正是这种情感的互动，韩家三兄妹才得以自强自立。

“苦难，是生命的玫瑰！”

刘有仁曾在一篇散文《苦难，是生命的玫瑰》中写道：“我们既然选择了黎明，也就选择了黑暗；人类执著地追求幸福，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勇气随时准备承受生活的苦难——苦难，是生命的玫瑰！”

刘有仁的同事杨勇说：“平时只是感觉刘有仁是一个勤奋、老实、诚恳的人，真没想到

到一个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，触动很大，他资助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生，而是拯救了一个家庭。”

2007年12月25日上午，湖南省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肖建平接受《法制周报》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刘有仁有一颗美丽的心灵，能发现身边需要关心的人，并且愿意伸出援助之手。他14年以来持之以恒资助他人，这种精神十分可贵！”

肖建平说，刘有仁出身贫寒家庭，比城市里富裕的人更能体会别人的难处，更能伸出援助之手。十多年来，刘有仁不论是身为学子，还是作为检察官，他都始终如一地默默关爱、支持着韩鑫兄妹们的学业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兄妹三人中有两人考入大学，读高中的小妹也成绩优异。

湖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党总支书记陈良鹏告诉记者，刘有仁1997年大学毕业，先后在湖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和公诉处工作，在近10年的反贪工作中，他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。因工作业绩突出，多次立功、多次受到省院嘉奖。2007年9月，他参加竞争上岗，被任命为湖南省检察院公诉三处副处长。

“这么多年来，我只知道刘有仁家庭很穷，他刚参加工作时，一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元，还要供弟弟妹妹读书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他资助革命老区的贫困家庭三姊妹上学的事。”陈良鹏说，“他真不容易啊！”

发稿前，韩鑫给记者发来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：“我们只能用行动来报答哥哥对我们十多年的支持。我们会早日完成学业，学有所成，回报哥哥，回报社会。今后我也要像哥哥一样帮助像我这样的孩子，使他们感受到真情的温暖。”

据《法制周报》

绑匪开价500万16小时被拿下

2007年12月12日早晨7时，大同市同煤集团平旺医院前，刘丽军被绑架。刘的父亲时任同煤集团董事长。因受害人身份特殊，加之绑匪开出500万元的赎金价码，此案成为建国以来大同市最大绑架案。

4名绑匪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前科，自以为这样的身份能让他们逃脱法网。大同警方接到报案后16小时，安全解救人质，抓获全部4名绑匪。

2008年1月3日，4名绑匪被批准逮捕。

绑匪全是“急肠儿”

大同土话，把不愿卖力干活儿、梦想一夜暴富的人唤作“急肠儿”。制造这起大案的4名绑匪，全是这样的人物。

郝秦、龚丕仓是同煤集团矿工；陈刚是大同市财政局司机，3人是同学，均为44岁；41岁的武满仓无业，内蒙古人。

在被警方定为本案主谋的郝秦身上，“急肠儿”现象特别明显。

1月5日，记者在大同市矿区看守所见到了郝秦。他身高1.7米，微胖，秃顶很严重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。

20年前，郝秦开始做生意，卖西瓜、卖烤鸡、养中巴、开歌厅、开饭店，“生意做全了，可钱没挣下，还赔了6万元。”

1997年，郝秦跑到外地开了个黑煤窑。“当时煤炭最不值钱，挖一吨煤24元，18元都没人要。”赔了23万元后，郝秦回到大同，接着上班。1998年在矿上单身宿舍区，开了一家小吃铺，开始“打饥荒”。

“干了6年，打了6万元饥荒，也把我女人累倒了。”2004年夏天，郝秦妻子一个人搬运整麻袋土豆时，累得大出血。郝秦说，“这么多年，我女人跟着我受苦受累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她……”

“人没钱不如鬼”，这是郝秦的口头禅。2005年，他抵押房产证，借了笔高利贷，再到外地开煤窑。这一次，他又赔了20多万元。

再回大同后，郝秦很快在同煤集团马脊梁矿谋到了一个肥差——矿代办员。矿工眼里，这个岗位是工人中最好的，然而，郝秦没有好好珍惜。一年多时间，与队长克扣矿工们4万余元工资，事发后，被从代办员的位置上拿下，依旧下井。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，在郝秦看来，简直是活受罪。

2007年6月，郝秦决定绑架一个“有分量”的人。此后，郝秦先后找到了龚丕仓与陈刚。“我们都40多岁了，生活背景一样，没有钱，生活负担重。”他们将目标定在刘丽军身上。他们认为绑了同煤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一定可以敲到大笔钱。

不久，武满仓加入其中。4人经常聚在一起，研究、制定每个绑架细节。

董事长儿子遭绑

经过5个月的谋划，2007年11月初，他们租来无牌桑塔纳车，开始跟踪刘丽军。当时，刘父重病住入同煤集团平旺医院，刘丽军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，第二天早晨离开去单位上班。半个多月，4名绑匪完全掌握了刘的行踪。

2007年12月11日晚，4人全住在郝秦家。第二天一早，4人早早起身，分头出发。郝秦坐陈刚的现代车；龚丕仓乘武满仓开的桑塔纳。

车停在医院附近，4人全部进入医院住院部一楼等待。12日7时，刘丽军坐电梯下来，快走到楼门口时，4人将其绑架。

车上，郝秦与刘丽军开始讨价还价，从2000万元开价，一直搞到500万元，刘丽军相当“配合”，主动提出让朋友帮忙凑足送来。刘的朋友康茂接到电话后立即开始筹钱，当天下午5时许，已经筹足300万元，准备前往交赎金时，犯了难。钱谁去交，交了钱后，绑匪如果要将两人一起撕票如何应付？

晚上7时许，康茂与刘妻向大同公安局矿区分局报案。案情上报，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大同市公安局局长苏浩立即调动员分区分局、云泉分局、市局刑侦支队、特警，共500余名警力上案。

按照警方授意，绑匪再与康茂联系时，他以现金数额太大，不易筹集为由，拖延时间。每次通话时，康茂都要与刘丽军通话。指挥部确信，在没有拿到赎金前，人质的安全无忧。

两名绑匪落网

按照事先的安排，绑架刘丽军不久，绑匪即分为两组。武满仓开着桑塔纳车，与龚丕仓押着刘丽军；郝秦与陈刚在现代车上，与刘的家属

谈判、索要赎金。“桑塔纳”与“现代”始终在左云一带活动。两辆车走走停停，在大山里，羊肠小道转悠。瞅人烟稀少之地略停片刻后，怕遭人怀疑，接着开。两车相距在30公里开外。

郝秦会说宁武话，按照事先约定，由他出面对刘丽军的家属威胁恐吓，商量价格，通知筹款数量。

当晚，郝秦再与康茂联系时，康茂已经凑到300万元现金。他一再强调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。这样的要求，令郝秦感觉不对劲，“人质家属从来不敢与绑匪讨价还价，可康茂态度坚决，称见不到人生意不做了。”接到这个电话，“我预感到对方可能报警了。”

两辆车都在等着康茂凑齐最后200万元，依然在路上不停地行驶着。

郝秦虽然着急，还能尽量克制着少给康茂打电话，倒是武满仓急着让刘丽军不断打电话催要赎金。

当晚8时，武满仓通知郝秦：康茂已经凑够400万元，还在凑钱。郝秦此时已断定警方介入，命令他们：“立即将刘干掉，跑得越远越好。”然而，他的“命令”没有生效。同伙一心想着拿钱，还在不停地与康茂联系着。

当晚10时，武满仓的手机欠费，与郝秦失去了联系。“他们拿着忻州的电话卡，上面有100元话费，不到一天时间就打没钱了，你说他们与康茂打了多少次电话吧。”郝秦感觉到大难临头，13日凌晨4

时，与陈刚潜回大同市。

在陈刚家里呆了几个小时，两人商量开车去北京。逃往北京前，郝秦替武满仓交了话费。过了一会儿，当郝秦打通武满仓电话时，武向郝通报了个好消息：“刘丽军与他的司机联系上了，钱凑齐了，整整500万！”郝秦闻听后，立即与刘的司机通话，让对方来市区一处游泳场交钱。

其实，这全是警方安排好的。大同公安局分管刑侦的晋润喜副局长说，“用刘的司机换掉康茂，将本已没有信心的绑匪再次稳住，他们才没有放弃拿赎金的行动。”

2007年12月13日上午11时，刘丽军的司机将一个大编织袋放在指定位置后，驾车离去。郝秦下车拿钱。“我以为500万，咋也得有些分量呢，用力一拎，狠狠地闪了一下，一摸发现里面是水果箱。”郝秦叫着“完了，完了”钻进车内，催陈刚赶快开车。“我们还没掉过头呢，两辆奔驰车一前一后将道路封死，根本动不了。戴着面罩的特警拿枪顶到头上时，不知人家咋打了我一下，我软软地就倒地上了。再睁开眼时，已经被抬到车上了。”

从接到报案到抓获4名绑匪，警方用了16小时。

落网后，云泉公安分局负责审讯。刑警大队长张东东发现，根本无法展开审讯。“几个人惊魂未定，只说就是个开车的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张东东留出时间让4个人缓缓，慢慢回神。

郝秦自认为他们4个是太平凡不过的人，“咋看也是老实人，警察破案时，咋查也不会想到我们！”

两个小时的采访，不需要启发，也不用提问题，郝秦不停地讲述着，包括任何细节。当记者告辞时，郝秦倾诉的欲望似乎还没有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总觉得告辞来得突然。“黄粱一梦啊！还是外面好，在这里才知道自由多可贵。”

据《山西晚报》